

# 李敖：我給國學大師們看看病（一）

來源：網絡 作者：車輪旁的花草

三百年前，徐昌治編了《聖朝破邪集》。這八卷論叢是中國人對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議文獻，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論的集成。

三百年來，朝代換了，古人死了，這部書的紙張也變黃了，可是聖朝破邪的細菌並沒有消失，它鑽進中國人的感情里，一代又一代，隨著愚昧程度的深淺而有着不同的病象：有時中體西用的諺語出現了，那好像是一場傷寒；有時超越前進的怪調出現了，那好像是一場白喉；有時義和團的瘋狂出現了，那好像是一場猩紅熱。

三百年來，我們民族的感情變成這種細菌的函數。在思想上，我們不是一個正常發展的有機體。在別人都朝着現代化的跑道競走的時候，我們卻一直發着怪病，一直在跑道的起點逡巡不前。我們總想找點理由來拒絕賽跑、奚落賽跑，同時斷言賽跑的終點將是一個悲劇。

三百年了，原在我們前面的，離我們更遠了；原在我們後面的，也紛紛跑到我們前面去了。可是我們還不肯勞動足下去快跑，我們還在腦袋里做着後來居上的迷夢，夢着我們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選手，我們總想憑點祖上的余蔭來佔便宜，總想憑點祖傳的步法迎頭趕上。

三百年的迷夢不可謂不久，三百年的失敗不可謂不多，三百年換湯不換藥的惡果不可謂不大。民國以來，我們的病況雖有起色，可是我們並未真正健康起來，活潑起來，我們還有許多不健康的心病，成爲我們賽跑時的阻力。如果我們真想在現代化的跑道上做一個尾隨不捨的健兒，如果我們真想在年輕民族的背後脫掉我們的暮氣，我們必須把這些心病做一次徹底的治療。

遺憾的是，歷來研究這些心病的醫生本身就是病人。偶爾一兩個沒破傳染的，卻又接近蒙古派——對病情的診斷和病歷的瞭解完全是枝節的、籠統的、混淆的。

基于這種現狀，我不得不把從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請到一起，從他們中間，精選一些有代表性的豪傑做爲病例。再依這些病例，把他們厘定爲十一種病名。在這些病名底下，我抱歉竟有許多民族英雄、達官貴人和名流學者做了我這些病名的捕獲品。換句話說，竟有這麼多的愛國的人兒因爲“愛國不以其道”，反倒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罪人。這種不幸說來令人傷心，可是做爲一個文化醫生，他有消滅這些病菌和防上它們蔓延的責任。婆婆心腸不能阻止傳染病，阻止的方法在於無情的指控誰是蒙古醫生、誰是病人、誰是就要被感染的倒霉鬼。

面對這三百年來聚訟紛壇的死結，想一個歷史的觀點來透視它，顯然是值得的嘗試。基于這種看法，我決定開始我的指控：

## 義和團病

義和團的祖師爺是清人張祥晉。他大概想學司馬相如那一套，寫了一篇《擬論味喇堅（口字旁）佛蘭西等各夷檄》。他的最大希望是：舳舻一炬，借赤壁之東風；鼓金齊鳴，窮朱儒于南海……克張斐相之英風，奚盧盧循之小寇？（阮元等編《學海堂三集》卷十七）

他這種口誅筆伐的夢想居然真有人拿來實行了，那就是義和團。義和團是排斥西方最純粹的分子，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。他們對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，所以會表演大刀對洋槍、赤膊擋洋炮。他們不但深信中學爲體，也深信中學爲用。他們是道道地地的黃帝子孫，他們雖然光榮的失敗，害得全國同胞每人都賠了銀子，可是他們的陰魂不散，陰魂附在辜鴻銘身上，鼓舞這位老怪物寫《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》（《春秋大義》），來做他們的安魂曲。“春秋大義”式的思想與義和團思想事實上是一個窩里燒出來的，只是表現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。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，在思想上愈以“不忘本”標榜的，愈接近此類。這一派顯然是式微了，因爲他們既無義和團的勇氣，又無辜鴻銘的妖焰，只好以古稀之年，籌辦他們的中國道德勵進社去了。

## 中勝于西病

這種病是很明顯的文化優越感，根本不承認西方勝過我們。代表這種論調的可以舉清人阮元做例，阮元說：

天文算數之學，吾中土講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……學者若能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，則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，有非西人所能及者。（《疇人傳》卷四十四“利瑪竇傳”）

民國以後，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氣說話了：

吾國今日所急需要者……一切依自、不依他。高視闊步，而游乎廣天博地之間。空諸倚傍……體現真理，擔當世運，恐非西洋人識量所及。（《十力語要初續》）頁一

又過六年，牟宗三又套他老師的話開口了：

……知華族文化生命之圓融通透，與夫聖學之大中至正，其蘊藏之富、造理之實，蓋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。（《認識心之批判》序言）

我們試看這三人所用的句法：“非西人所能及者”、“非西洋人識量所及”、“非任何歧出

者之所能企及”，完全是如出一轍的抹殺主義。他們的句式都是“非……所及”的格局，都有着目空一切的狂妄，但是他們三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，這種妙人今天還多着呢！試看有多少人摒西醫不用，而迷戀着五運六氣“寸關尺”的中醫，有多少人摒正規音樂不學，而迷戀着七音六呂“笙簫緣”的國樂……這種中勝于西的觀念最容易導來“以此類推”、“舉一反三”的夸大，而這種夸大卻又正是濫用“民族自信心”的顯例！

## 古已有之病

犯這種病的人並非不講西學，而是認爲這些洋玩意都是我們古書中早就說過的現話。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，他在《劈邪說》中罵利瑪竇道：

近復舉其伎倆一二，如星文律器，稱爲中土之所未見未聞，竄圖訂用，包藏禍萌。不思此等技藝，原在吾儒覆載之中。

這種“原在吾儒覆載之中”的大言，在我們國民心中流傳很廣：阮元就拿過後漢的四分法來比西洋數學（《疇人傳》）；印光任就拿過周牌來包括“渾蓋通憲之器，寒熱五帶之理”（《澳門紀略》）；陳啓天就拿過孟子的後來比近代民主政治的觀念（《中國政治哲學概論》）；毛子水就拿過大戴禮記“四角之不相揜”的話來比西方的地圓說（《中國科學思想》）。現在某些人做一些事，動輒以古人“先得我心”而自喜的，或以“與古法合”自傲的，都是“古已有之”病患者，你若問他“孔子周遊列國時

乃是：三代聖時，聲教四訖，重譯向風，則書籍流傳于海外者，殆不一矣！周末疇人子弟，失官分散，嗣經秦火，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；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傳。此西學之所以有本也……（卷一，《周牌經解叙》）

這真是毫無歷史根據的謊言！本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，“聲教四訖”的情形不是沒有。例如：養蠶、造紙、瓷器、檸檬、大黃等的西傳，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實。但若根據史乘，認爲一切都是“吾家舊物”，一切都是西人“陰謀以去”的，這就未免有點無賴了。而要這種無賴的，紀曉嵐和他老師劉文正最爲拿手，在《灤陽續錄》卷一中，我們可以拜讀他們的高論。

這種“中土流傳”病本是“禮失求諸野”觀念的翻版，這種病嚴重以後，就會亂做浮夸的歷史考證：什么法蘭發現美洲啦、詹天佑發明火車掛鈎啦、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啦、宋儒理學對歐洲文化劃時代的影響啦，不一而足。又常見一些人最愛拈出羅盤、火藥、印刷術來驕人，殊不知這些東西早就在洋人手里脫胎換骨好多次了！

## 不得已病

近三百年前，楊光先和比利時的南懷仁斗曆法失敗，遣戍歸來，寫成了《不得已》。他呼籲“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，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”，躲在這種態度背後的動機，說穿了，不過是怕洋人“收吾天下之人心”罷了。這幫子人一方面

么？否認一切西洋把戲，更不沾戀！西洋把戲之真不得而用之也！

“更不沾戀”，“真不得而用之”，這是何等不得已的調調兒！現在很多人因爲賺不到錢轉而歌頌“抱布買絲”的農業社會，因爲討不到老婆轉而留戀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婚姻，最後詆毀工業文明、攻擊自由戀愛，究其微意，不過“不得已”三字耳！

## 酸葡萄病

這種病患者對西洋把戲的口號是：“沒有什麼稀罕”“又有什麼了不起！”明末許大受的《聖朝佐闢》最能發揮這種高論。他認爲洋鬼子的東西“縱巧亦何益於身心？”他舉的例子是：

……自鳴鐘，不過刻漏耳！費數十金爲之，有何大益？桔槔之制，曰人力省耳，乃爲之最難，成之易敗，不反耗金錢乎？火車（此指火炮）等器，未能殲敵，先已火人，此又安足尚乎？

這些“有何大益”乎、“反耗金錢乎”、“又安足尚乎”，全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專用語彙。乾隆時英國使臣請福大人參觀他們的兵操，可是福大人的答話可妙了：

看亦可，不看亦可。這火器操法，諒來沒有什麼稀罕！（《乾隆英使觀見記》頁一〇三）

這就是許大受的“體”與福大人的“用”！犯這種病的人比患“不得已”病的還低級：後者起碼還承認外國好，可是我們不要他的好；犯這種病的人就不同了：他內心深處覺得外國好，可是在外表上，他一定要表現“張脈憤興”，一定要理由化（rationalization），好使他心安一些。這種善爲巧飾的心理，三百年下來，還是完美的遺傳着，世風是日下了，可是人心並沒有。不古呀！

以上六派都可說是純粹排斥西方的。他們共同的色彩是西方並不值得學，我們固有文化是無待外求的。在這六派中，有的已經變得乖巧了，至少他們不再用義和團的符咒來征服世界了，他們要用齊如山夢想的“國舞”來“遠征世界”了。無論如何，在精神上，他們永遠是勝利者，永遠站在洋鬼子的肩膀上，任憑鬼子們一尺一丈的增高，我們這些“癩頭老子”是絕不在乎的！

##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病

這是中國人文字魔術最蠱惑人的一次表演，也是最不通的一次表演。張之洞高叫的“舊學爲體，西學爲用”，在表面上，至少承認西學可供“採補”，至少想“擇西學之所以補吾閉者用之，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”。但是用儘管用，必得“西學先由中學”，孫家鼐的兩句話把這種理論的核心點破了：

中學包羅西學，不可以西學凌駕中學。

這就是他們骨子裏的真精神！這種精神，事實上只是奕訢、文祥、曾、李、左等人洋務理論的“建構化”。當然張之洞之流把它建構得很別致、很迷人，既維新又衛道，最適合焦灼狀態下的國人的口味。順着這種思路滑下來，在民國二十四年出了一件怪事，就是盛極一時的《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》，俗稱“十教授宣言”。這十教授是：王新命、何炳松、武靖干、孫寒冰、黃文山、陶希聖、章益、陳高備、樊仲雲、薩孟武。他們在宣言里頗藐視中體西用的見解，但是他們筆下的“根據中國本位”、“具有中國特徵”，卻正好是“中學爲體”的盜版，“吸收歐美的文化……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”，卻正好是“西學爲用”的化身。這真是數典忘祖的大笑話了！據我看來，王新命諸公唯一比張之洞之流高明的，只是抬出一點“批判態度”來做取捨標準，而張之洞在這方面的念頭似乎沒有他們強烈。但是這一點並不重要，他們在“殘基”（residues）上面和張之洞是完全一致的。他們真可說是“友天下曾經致力於黨務之士，尙論古人”了。

## 東方精神西方物質病

這一派的頭腦構造跟前一派是大哥哥哥的，都是二分法的構造。前一派是體用二分法，這一派是精神物質二分法。

在體用二分法上，若只把西學局限在科學工藝的“用”上，便很容易轉形爲這一派了。所以老實說，這一派比體用二分法還淺薄。這一派的理論本是清季“中學治身心，西學應世事”的蛻變，到了《歐游心影錄》（一九二〇年）時代的梁啟超和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（一九二二年）時代的梁漱溟，突然有了新的氣象。下傳至陳立夫得意的時代，這種理論更是日正當中了。

陳立夫寫《中西文明的特質與新文化的創造》，劈頭就說西方有“物質的重心”，而東方“正和他們異趣”，有“精神的重心”：

中西文明的長短互見，一個是偏于精神，一個是偏于物質。我們要趕快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，創造完美的新文這種斷釘截鐵的確定感（senseofcertainty），由這麼一位大護法來多年推行，無怪在今天能收到“洋洋乎”的效果了！

## 挾外自重病

妄自尊大是自己來肯定自己，挾外自重是拉別人來肯定自己。二者肯定的方式不一樣，肯定的目標則無二致。三百六十年前，利瑪竇所以能大行其道，主要乃在他宣言他那套“與中國佔法吻合”。梁章鉅《退庵隨筆》中就說大主教義“與儒書，又何所異焉？”

網上繼續刊登



為什麼坐馬車不坐汽車？”他並不說“那時候沒有汽車”，他的答復是：“那時候的馬車就是現在的汽車。”這種夸大誕妄的先生門，說破了，不過是古人屍影下的奴隸罷了。

## 中土流傳病

犯這種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夸大狂。前一派只是“本來我們就有”，這一派則是“本來是我們的”，“兩洋近代文明是我們傳過去的。”在清人允祿的《數理精蘊》里，竟說西洋教士的天算格致：

詢其所自，皆雲本中土所流傳。而其原因，

想要人家的文明，一方面又覺得要了危險，想來想去，決定還是不要好。

這種畏患的小心眼兒，投鼠忌器的謹慎，真是怪可憐的：他們怕這一變，連腐朽的老本也沒有了。梁漱溟後來寫《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》（民國二十二年）時，已經明顯的轉入“不得已”派，他那種“最後覺悟”的語氣是很沉痛的，他一方面中國之於西洋，有所不及則誠然矣！（頁九十七）一方面又自甘不及，他說：

悟得了什麼……于一向之所懷疑而未能遽然否認者，現在斷然地否認他了……否認什